由于史料的丰富，以及清代后期处于一个“世界体系”的中国历史维度的复杂化，剑桥清代史的写作分成了前中期史和晚期史两卷。这里点评的是前中期史的上卷。

本书的叙述范围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帝弘历，前半部分是记叙体，后半部分则是专题性的研究，但笔者并没有读完专题研究的所有章节，只选取了自己感兴趣的部分。

同笔者阅读剑桥明代史上册的感受一样，清史研究的领域也缺乏一个扛鼎之人，各方面的研究，包括经济的、文化的、政治的、制度的等等，都只是较为泛泛的展开，并无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发现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所指的“眼前一亮”，并不指那种专为夺人眼球而无真才实学之举，此则与学术无关，而是指那种对于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次“逻辑”有一个把握，并能够精炼地总结形成于简洁的文字。有时候这种“深刻性”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准确性，但却能给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，无论是在此基础上做出批判或找出进一步确认的证据，该领域的探索都是向前走了一大步。

余英时对清代有过这样一种简单的判断，满人统治中国如同一个党——“满洲党”，在晚清国家动荡之际，清廷提出的口号是“保大清”而不是“保中国”。余英时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，也契合了钱穆对于清朝始终没有脱离“部落政治”传统的判断，笔者认为颇有道理。但本书对于满人与汉文化的这种冲突并没有能够描绘出来。确实，就本书所描绘的时代来看，从康熙到乾隆都有意于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全中国的统治者，而不只是满人的皇帝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持平满汉之关系。但是，有这样一些历史的细节颇需注意，一是康熙在学习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时，有记载表明其曾专门嘱咐不可让汉人、蒙人学去；二是比照北魏的汉化政策，清代与其说是“汉化”，不如说保持了一种近似于“二元政治”的结构，满人身份始终抱持着一种较汉人的优势地位，清代配享太庙的十几位大臣中，也只有张廷玉一名汉人。这种身份政治在国家治理、社会文化中的巨大张力，对于清朝的政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并在晚清的乱局中得到了放大。

本书对于此点的忽略，或许是由于西方学者在异文化语境下的陌生。而大陆学界近来也为有着墨于此，大抵该是政治团结之缘故。不过，这里有一个需要额外警惕之事，这种对于“忽视”的重视也不可在没有更多证据的前提下过分放大，只能当作是一种假说加以接受。

关于本书的其他一些缺点，马子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的比较详细，不过在其文中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，一些批评的出发点学术上的理由不多，倒是更多表现为与大陆政治正确的相悖，这就不能为纯学术的考量所认同。除了上述的“满洲党”问题外，笔者以为本书最大的争议在于为本书撰稿的作者，似乎都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把握有所缺乏，历史事件、人物臧否往往局限于同时代的横向比较，纵向的范围不超过明、清两代的界限。如此，对于中国史的理解很难够有比较深入的发现，许多可能在粗了解中国古代史全貌的读者看来比较明显之现象，则全被本书的作者所忽视，或只是草草一笔，未加注意。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缺陷，又是一种文化认知的隔离。